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



马克思主义专题研究文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

(第3辑 · 2014)

邓纯东 ●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



马克思主义专题研究文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

(第3辑 · 2014)

邓纯东 ●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 第3辑, 2014 / 邓纯东主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3
(马克思主义专题研究文丛)
ISBN 978 - 7 - 5161 - 7861 - 4

I. ①中… II. ①邓… III. 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
IV. ①D6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63192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赵 丽
责任校对 王佳玉
责任印制 王 超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6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6
插 页 2
字 数 439 千字
定 价 9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编委会

主 编 邓纯东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列)

卫建林	王伟光	尹韵公	田心铭	有 林
李 捷	李崇富	李慎明	肖贵清	聂运麟
沙健孙	张全景	赵 曜	侯惠勤	徐光春
徐崇温	梁 柱	程恩富	靳辉明	秦 宣

前 言

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党的理论工作，重视全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研究工作。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更是把意识形态工作作为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来抓。

2004年1月，《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下发，并决定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把中国社会科学院努力建设成为马克思主义坚强阵地、党和国家的思想库智囊团（智库）、哲学社会科学的最高殿堂的要求，中国社会科学院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2009年初决定把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与理论研究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并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与理论研究工程领导小组。领导小组成立后，一方面注重抓好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组织机构的建设，设立马克思主义理论类别的研究室和中心等；同时又注重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

为了推进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决定从2011年开始编辑出版“马克思主义专题研究文丛”，每年收录全国范围内相关学科领域具有代表性的文章，集中展示相关学科研究的优秀成果。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
与理论研究工程领导小组

2015年1月

目 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

“中国道路”命题的提出、实践探索及其历史启示	李辽宁(3)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丰富和发展	王伟光(15)
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丰富 和发展	秦 刚 李辽宁(28)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新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学习体会	裴长洪 李程骅(41)
制度自觉、制度自信和制度创新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论述	秦 宣(56)
邓小平理论中的社会主义制度自信思想述论	齐卫平(67)
从制度选择到制度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 生成逻辑	王成礼(78)
邓小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	雷 云(9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鲜明特质和世界意义	邓纯东(10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五大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演变的逻辑与意义	梁树发(109)
全面准确理解市场与政府的关系	刘国光 程恩富(119)
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丰富内涵及重大贡献	魏礼群(130)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协商制度研究的四重维度	王学荣(14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实践前提与创新

逻辑	张明军 陈 朋(147)
以“渐进的办法”改变旧的社会经济结构	
——经典作家研究理想社会的原则及思想与	
实现中国梦	俞良早(173)
十年来国内学界关于人民内部利益矛盾的研究述评	刘起军(186)
邓小平论社会主义的本质与核心价值	李德顺(200)
改革开放以来价值观的变迁与	
核心价值的解构	廖小平(206)
传统文化中的道德养成路径及其当代价值	金民卿(215)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十大理论与实践问题	邝庆治(224)
从生态政治视角看生态文明蕴含的执政文明	方世南(246)
生态文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新增长点	黄力之(255)

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中国梦的精神实质与制度建设	严国萍(271)
中国梦、世界梦与新国际主义	
——关于中国梦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	郭树勇(279)
建设现代治理体系保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房 宁(296)
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价值目标	胡 澜(301)
习近平全面深化改革思想的鲜明特征	辛向阳(310)
全面准确深入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	王浦劬(317)
全面深化改革必须把握正确方向	唐洲雁(339)
依法治国与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肖贵清(348)
习近平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思想论析	许耀桐(357)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基本构架	吴传毅(367)
推动形成从严治党新常态	
——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总结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 国防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377)	

坚持党的领导 依规管党治党 为全面推进依法

治国提供根本保证 王岐山(382)

解决“四风”问题要从思想根子上抓起 李慎明(390)

党要管党 从严治党

——习近平执政党的建设讲话的中心思想 姚 桓(400)

后记 (408)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理论体系、制度

“中国道路”命题的提出、 实践探索及其历史启示

李辽宁

近年来，关于“中国道路”的研究和讨论广受关注。所谓中国道路，是针对“外国道路”尤其是“西方道路”来说的，实质上就是指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之路。从社会形态的转变来看，中国道路是指中国从一个落后的封建农业大国，发展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历史过程。^①从内涵来看，广义上的“中国道路”可以包括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之路；狭义上的“中国道路”主要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简称。^②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中国道路”的选择，不是根据人们的主观意愿预先设计的，而是由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所决定的，具有鲜明的客观性和时代性。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强的今天，我们一方面要正视历史，珍惜来之不易的伟大成就；另一方面要勇于创新探索，继续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全面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一 “中国道路”命题提出的背景及其相关争论

命题是时代的产物，它总是与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和历史任务相联系。“中国道路”命题的提出是与近代中国的历史命运和时代使命密切关联的。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帝国主义列强

① 许建康：《跨越“卡夫丁峡谷”与中国道路》，《学习与探索》2011年第5期。

② 李慎明、何成、宋维强：《“中国道路”的六个内涵》，《科学咨询（科技管理）》2011年第2期。

侵略中国，在一方面促使中国封建社会解体，促使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因素，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了半封建的社会；但是在另一方面，它们又残酷地统治了中国，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①在此过程中，中华民族饱受屈辱。而摆脱这种屈辱，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自然成为华夏儿女挥之不去的“梦”，也是“中国道路”命题提出的直接动因。从那时起，“中国道路”命题就指向两个相互关联而又前后一贯的目标：民族独立和民族复兴。

从思想观念层面来看，所有关于“中国道路”的认识和论争都直接指涉对“中国向何处去”的追问。鸦片战争失败后，面对西方列强的冲击，“向西方学习”成为开明官吏的共识，从“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则徐，到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魏源，都持有这种思想。不过此时“向西方学习”的基本原则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此后，围绕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先后出现了学校与科举之争、中学与西学之争、旧学与新学之争、文言文与白话文之争、科学与玄学之争等。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关于东西文化的论战达到高潮。这些论争反映了清末民初我国思想文化界的总体动向以及对社会发展道路选择的不同态度。限于篇幅，在此本文仅就与“中国道路”命题密切关联的几次大论战进行回溯，即东西方文化观的论战、“以工立国”还是“以农立国”的论争、中国社会性质的论争。

（一）关于东西方文化观的论战

关于东西方文化观的论战，从1915年起一直持续了十余年，根据其主题的变化，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15年《青年杂志》创刊到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前，论战的重点在于比较东西方文化的异同和优劣；第二阶段是五四运动爆发后，论战的重点是东西方文化能否调和、新文化与旧文化的差异以及如何处理新文化和旧文化之间的关系；第三阶段是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1920）和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21）出版后引起的激烈论争。^②

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思想文化论战中，各路名士纷纷出场，大致可分为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0页。

^② 陈崧：《五四前后东西方文化问题论战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5页。

“新文化派”（以陈独秀、李大钊、胡适、杨明斋等为代表）和“东方文化派”（以杜亚泉、梁漱溟、章士钊、伦父等为代表）。随着世界形势的发展，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各派内部也有分化，比如，梁启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通过在欧洲的亲眼所见，认识到西方国家存在的问题，于是从崇信西方文化转变到反对西方文化；陈独秀、李大钊等从早期的“西化派”逐步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而胡适、张东荪等则继续为资本主义辩护，坚持走“西化”道路。而且在新文化阵营内部的李大钊和胡适之间还展开了“问题与主义”之争。虽然这场论战在1927年以后由于思想战线上争论的焦点转到社会性质问题而暂时告一段落，但是其影响十分深远。它不仅带来了思想文化上的巨大变革，而且深深影响着社会的政治、经济领域，尤其是锻造了最早的一批马克思主义者。这些对于后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走向，无疑具有革命性的重要意义。

到了1933年，在我国思想文化界又开展了一场争论。这一次是由《申报月刊》刊出“中国现代化问题号”特辑开始的。该刊物利用创刊周年纪念的机会，向社会各方面知名人士约写专题征文进行讨论。讨论的重点是两个问题：一是中国现代化的困难和障碍是什么，要促成中国现代化，需要什么先决条件；二是中国现代化当采取哪一个方式，个人主义的或社会主义的；外国资本所促成的现代化或国民资本所自发的现代化，又实现这方式的步骤怎样。^①

此后不久，1935年年初，陶希圣等10位教授发表了《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其政治背景是国民党政府为了配合所谓经济建设而提出进行三民主义的文化建设，随后在全国掀起了一场中国文化问题的大争论。这次争论的双方分别是以陶希圣等为代表的“中国本位”派和以胡适为代表的“独立评论”派。值得注意的是，此次争论的双方在讨论中逐步接近，相互吸收。像陈序经的“全盘西化”论从一开始就遭到从西化派到中国文化本位派的批评和责难，因而在这次讨论之后，“全盘西化”的口号就不再被人提起了。通过争论，人们逐渐用“现代化”概念取代“西化”“中国化”等概念，并把现代化的基本内涵确定为工业化、科学化、合理化和社会化。

^① 罗荣渠：《从“西化”到现代化——五四以来有关中国的文化趋向和发展道路论争文选》（上册），黄山书社2008年版，第16—17页。

（二）关于“农化”还是“工化”的论战

这是五四运动前后一场与中西文化问题基本同时开展的一场论战，但持续的时间更长，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论战双方分别是：主张“农化”（以农立国）的代表人物是当时北洋政府教育总长章士钊，所有反对中国大革命的封建顽固派、阻止新思潮反对新文化运动的国粹派和“甲寅派”，以梁漱溟为代表的鼓吹复兴中国文化的新旧调和派等，都站在以农立国的一方；主张“工化”（以工立国）的代表人物有恽代英、杨铨、杨明斋等。第二阶段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以农立国论”代表人物为梁漱溟，与之相对立的是以吴景超为代表的《独立评论》派。第三阶段发生在20世纪40年代初，这次有专门研究农业的学者和企业界人士参加，学术探讨也更加深入。

最初鼓吹“以农立国”的代表人物是章士钊（章行严），他在《业治与农》（1923）中提出了“以农立国，文化治制”的思想，立即引起激烈的争论，支持其观点的有董时进等；质疑者中有孙倬章等。归纳起来，大致可分为四种观点：第一种是主张复兴农村，通过振兴农业以引发工业；第二种是主张发展工业，认为振兴都市工业才能救济农村；第三种是先农后工，主张首先使农业工业化，在农村培植小规模农村工业，作为向工业社会过渡；第四种是主张农工并重，提出发展民族工业和实行民主主义的计划经济等。到了20世纪40年代，翁文灏提出“以农立国，以工建国”二者相辅相成的新观点。^①

应该说，这些讨论反映了在20世纪30年代，在世界经济危机打击下，我国学者关于如何挽救当时中国经济面临的严峻形势、走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一些思考。在这场论战中，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中国共产党参与不多。虽然讨论因解放战争而终止，但是其中关于农业和工业的相互关系等问题的讨论，比如许涤新在《中国经济的道路》（1945）中提出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和“建立现代化工业和推动合作经济”的思想，以及学者们关于工业化的具体条件、工业化的利弊等问题的探讨，对于今天我们推动工业化、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仍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① 罗荣渠：《从“西化”到现代化——五四以来有关中国的文化趋向和发展道路论争文选》（下册），黄山书社2008年版，第740页。

（三）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

关于如何认识中国社会性质，早在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这个问题就逐渐被提出来了。^①而发生激烈的论战，则是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其直接动因，是大革命失败后，不同社会政治力量对于中国社会性质的审视和判断。相对于以往的论战而言，这次论战具有更加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它涉及中国应当进行什么性质的革命、依靠谁来革命、革命往哪里发展等问题，关系到发展革命还是取消革命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这场论战不仅是理论问题，更是政治问题，是当时政治思想战线上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之间一场尖锐斗争。

1927年以后，“中国应走什么道路？”“中国向何处去？”这样的追问严峻地摆在全国人民面前。1928年6月召开的中共六大，确认当时中国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性质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同时指出，把现时中国革命说成“不断革命”是不对的。这一论断遭到了敌对阶级或政党来自“左”和右的方面的攻击和反对，但得到了进步的理论家和历史学家的支持和捍卫。

从1929年起，陈独秀陆续给中共中央写了3封信，认为大革命失败标志着“资产阶级取得了胜利”，封建势力已经“变成了残余势力之残余”^②，中国社会已经是资本主义占优势并将得到和平发展的社会；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结”，无产阶级只有等到将来再去搞所谓“社会主义”。这实际上是“取消革命”论。他在被开除出党以后，与托派分子一起对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革命任务等方面的马克思主义分析进行攻击。参与这场论战的还有国民党内的一些文人，以陶希圣等为代表，其主要阵地是《新生命》杂志，也被称为“新生命”派。此外，较有代表性的还有以陈公博为代表的国民党改组派，以及以胡适为代表的改良派。不过，由于国民党文人的面目大多都暴露无遗，胡适等学者又是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因而其影响力便不如托派。因此，从论战对象上看，虽然马克思主义者对国民党改组派和改良派都进行了必要的批驳，但是论战的主

① 高军：《第一次国内革命失败后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史学月刊》1982年第2期。

② 《陈独秀关于中国革命问题致中共中央信》，中国国情网，http://www.china.com.cn/guoqing/2012-08/30/content_26745482.htm，2012-08-30。

要对象还是托派。

值得注意的是，由这场论战还延伸出另外两场论战：一场是关于中国社会史的论战；另一场是关于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论战。这两场论战都是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的深化。在这些论战中，马克思主义者组织了革命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在《新思潮》《读书杂志》《布尔塞维克》《中国经济》等刊物上发表文章批驳托派的观点，宣传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基本看法，得到了社会的广泛理解和认同，同时也教育和动员了广大人民群众坚持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论战以后，托派、新生命派等反马克思主义观点被进步的人士所唾弃，更多的人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主张。

二 “中国道路”的实践探索

从时间上看，对于“中国道路”实践探索的考察应该追溯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这是一个跨越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大约 120 年的大跨度历程^①，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 世纪 40 年代至 20 世纪 20 年代，这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前，中国人对于“中国道路”的早期探索。“自从 1840 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② 寥寥数语，勾勒出长达 80 年中国人寻求国家复兴的艰难历程。在这一时期，为了从贫困落后中摆脱出来，从政府和民间分别涌现出巨大的变革力量，太平天国、戊戌变法、辛亥革命……虽然最终推翻了几千年的君主专制，但是结果仍然不尽人意，“民族独立”和“民族复兴”这两个目标，一个也没有完成。“太平天国的失败告诫人们，不冲破小农经济的狭隘界限，不大力发展近代资本主义工业和商业，中国无法摆脱封建主义的束缚而迈向近代；戊戌变法的失败告诫人们，不从根本上改变对人民大众的立场，不用武装革命的方式夺取政权，资本主义便难以成

① 王庆五：《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与中国经验》，《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9 年第 3 期。

②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469 页。

长；辛亥革命的失败则启发人们，不触动农村的封建关系，不折断帝国主义伸向中国的魔爪，中国希冀独立自主发展只是空想，而资产阶级的新政权也难以确保从而作为国家也就并不能真正从封建主义的旧天地里走出来。”^①“一切别的东西都试过了，都失败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唯一的路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②

第二阶段：20世纪20年代初至40年代末，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革命道路。这一时期的主旋律是，中国人民与帝国主义、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展开中国命运的大决战，最后推翻“三座大山”，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这一进程既与国共两党的斗争与合作相同步，又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反对日本法西斯主义的国际大背景相交叉。在国际正义力量的支持下，中国人民最终战胜了日本法西斯，取得了近代以来反抗外来侵略战争第一个完全意义上的胜利；在国内外正义力量的支持下，中国共产党最终推翻了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建立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这一伟大成就的取得，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打下了必要的基础，同时为“中国道路”开辟了光明的前景。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除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这条道路以外，还有一些坚持“教育立国”的教育工作者在全国各地倡导和实施“乡村教育运动”。他们认为要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关键在于教育，特别是农村教育。为此，要从教育农民着手以改进乡村生活和推进乡村建设。^③ 这些做法对于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有积极意义。但是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浪潮的推进，这些运动逐渐走向衰落。事实证明，在战争频仍的动荡年代，

① 曹锡仁：《幻想与现实：中国道路》，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85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1页。

③ 比如，晏阳初1923年发起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用“三大方式”（学校、社会、家庭）进行“四大教育”（生计、文艺、卫生与公民），企图解决中国农村的“四大病”（贫、愚、弱、私），并实现“六大建设”（政治、教育、经济、自卫、卫生和礼俗）；中华职业教育社于1926年在江苏昆山徐公桥设立乡村改进区，推行社会教育，改进小学教育，以培养新农民，同时改进农业；1926年，中华教育改进社主任干事陶行知主张以乡村学校作为改造乡村生活的中心，先后创办晓庄学校和山海工学团，注重培养农民在军事、生产、科学等方面的能力；1931年，梁漱溟等成立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除指导研究生和训练乡村服务人员外，还在邹平、菏泽两个实验县办理乡农学校、乡学村学；30年代，以高阳为代表的江苏省立教育学院设有研究实验部，在无锡设了惠北实验区、北夏实验区等，进行乡村成年民众教育、电化教育、农事教育，实行改良蚕桑、养鱼植树开荒，增加农业生产等。此外还有其他一些乡村建设学院。